



浙江财经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CEBD 简报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A 类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

>>> 2021 年 12 月 20 日

2021 年第 4 期
【总第 16 期】

目 录

01

CEBD 出席“2021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
经济学论坛”

02

上海财经大学杜宁华教授在 CEBD
做学术报告

03

罗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学者系
列专访之三——杜宁华教授

04

CEBD 博士后陈俞有出站以优异成绩
入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05

2021 年 CEBD 科研成果统计

CEBD 出席 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 实验经济学学术论坛

2021 年 10 月 22-24 日，应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弈决策与行为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何浩然教授和张博宇教授的邀请，CEBD 首席专家叶航携中心 8 名博士后与研究人员赴该校参加“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实验经济学学术论坛”。叶航教授在会上作“神经经济学与神经实验带给我们什么？”的学术报告。



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多所国内大学的七十多位现场参会者，其中包括三十多位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演讲人和近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本届论坛分主会场和两个平行会场，与会的三十二位学者进行论文展示，并于线上同步转播。

现场参会者在北师大经管学院与四十余位线上参会者同步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展示论文涉及内容包括神经经济学与神经实验、风险态度的非参数化测定、外生冲击、网络结构和系统性风险、民族构成与竞争倾向、过度自信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中的社会关系与人力资本研究等等。与会嘉宾就演讲人展示的论文进行深入交流，现场讨论氛围活跃。



何浩然教授主持会议



张博宇教授主持会议

本次论坛的召开，有助于加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与国内外院校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国内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



附：

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实验经济学学术论坛 主会场议程

Oct. 23, 2021 (Saturday) Jingshi Hotel 9406	
Time	Activity
8:30-8:45	Registration
8:45-9:00	Opening speech: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孙志军教授
9:00-10:30	Plenary Session 1 (Tencent Meeting ID: 624575532, Password: 211023) 神经经济学与神经实验带给我们什么? 叶航 风险态度的非参数化测定 赵琳
10:30-11:00	Group Photo and Tea Break
11:00-12:30	Plenary Session 2 (Tencent Meeting ID: 624575532, Password: 211023) 个体道德判断水平影响信息披露真实性的实验研究 杨晓兰 外生冲击、网络结构和系统性风险：来自实验的证据 陈叶烽
12:30-14:00	Lunch
Oct. 23, 2021 (Saturday) Jingshi Hotel 9407	
14:00-15:30	Parallel Session 1A (Tencent Meeting ID: 665599342, Password: 211023) <i>The Willingness to Share Own and Oth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 Monetary and Time Reward: An Experimental Study</i> Minda Wang <i>Risk as Excuse to Postpone Effort-Provision</i> Wenbo Zou <i>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within- and cross-cultural cooperation: Chinese and American play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i> Lijia Wei
15:30-15:45	Tea Break
15:45-17:15	Parallel Session 2A (Tencent Meeting ID: 665599342, Password: 211023) <i>Confusing Context with Character: Correspondence Bias in Economic Interactions</i> Yi Han <i>Deterrence Using Peer Information</i> Zhengyang Bao <i>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Online Reputation System in Credence Goods Market</i> Min Zhu
17:15-19:00	Conference Dinner

上海财经大学杜宁华教授 在 CEBD 做学术报告

2021 年 12 月 8 日，上海财经大学杜宁华教授在 CEBD 为基地硕博研究生、博士后 30 余人做学术讲座，题目为“缓解道德风险的动态信息披露：一个实验研究”（Dynam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Mitigating Moral Hazard: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杜宁华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系系主任。2005年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攻实验经济学。亚利桑那大学的经济科学实验室是北美最早成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基地，由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Vernon Smith创建。杜宁华近年来致力于运用实验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考察行为机制设计的基本问题，对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其研究成果发表于管理学顶级国际刊物*Management Science*、以及*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European Economic Review*等经济学国际一流刊物上，包括*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Decision Support Systems*等著名经济学和管理学国际期刊上。

该讲座报告了一个在道德风险框架下对信息设计的有效性进行测试的实验研究：代理人所从事的任务难度不确定，且难度较大的任务需要付出更高努力才能完成；委托人知道任务的难度，委托人的目标是诱导代理人尽可能多地工作，而代理人则权衡完成任务的回报和付出努力的成本。理论预测，任务难度的即时披露激励个体只做简单的任务，而任务难度的延迟披露将激励个体持续努力，即使任务很困难（Ely & Szydlowski, 2019）。实验证据表明，代理人在延迟披露条件下的表现优于即时披露。然而，该结果关键的是，只有当延迟披露的信息方案是由实验者提供、而不是委托人提供时才是正确的。

讲座结束后，杜宁华教授就相关实验设计和执行的细节与听众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基地研究生和博士后在实验中碰到的各种疑难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解答和辅导，极大提高了基地研究生和博士后在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方面的科研能力。基地首席专家叶航教授最后作了总结，并对杜宁华教授的精彩报告表达了感谢。

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学者 系列专访之三——杜宁华教授

杜宁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系系主任，第三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China BEEF）主席。2005 年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攻实验经济学。亚利桑那大学的经济科学实验室是北美最早成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基地，由 2002 年诺贝尔奖得主 Vernon Smith 创建。杜宁华近年来致力于运用实验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考察行为机制设计的基本问题，对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其研究成果发表在管理学顶级国际刊物 Management Science，包括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在内的经济学国际一流刊物上，以及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等著名经济学和管理学国际期刊上。





罗俊副教授对杜宁华教授的线上专访

罗：您2005年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攻实验经济学。亚利桑那大学的经济科学实验室是北美最早成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基地，由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Vernon Smith创建，后来还包括James Cox，Martin Dufwenberg等知名实验经济学家都在这个实验室工作。您当时接触实验经济学是怎样的契机，和这样的业界大佬一起学习、工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杜：我去美国读经济学的研究生是从1998年在休斯敦大学读硕士开始的。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第一年的主要内容就是“三高”——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特别巧合的是，休斯敦大学当时教高级微观经济学I的Nat Wilcox（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教高级微观经济学II的Nick Feltovich（毕业于匹兹堡大学，诺贝尔奖得主Al Roth的学生）都是实验经济学家。所以，我在研究厂商与消费者的个体决策理论、研究群体交互决策的博弈论等方面受到的经济学基础训练，都是在经济学实验的背景环境下完成的，这在北美是极其罕见的个案。受到他们的影响，告别经济学主流的“六大门派”，走上实验经济学这个当时主流眼中“魔教”的不归路，也就成了

自然而然的事情。完成了硕士阶段的学习，经反复权衡考虑，2000年我决定到亚利桑那大学这个实验经济学领域群星璀璨的地方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业，在那里我遇见了Vernon Smith, Jim Cox, Martin Dufwenberg, Mark Isaac, Kevin McCabe, Stan Reynolds, Dan Houser等众多师长，他们的教诲给我以后的学术生涯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以年龄长幼为序来聊聊我的这些老师。



Vernon Lomax Smith

Vernon Smith是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Smith教授颠覆了我对学者的传统认识。在我以往的认知里，“学者”应该是我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的老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李子奈老师那样的人。看到Vernon Smith这个老头子穿着大花裤衩、手指头上戴满了戒指、留着大辫子和小胡子，在亚利桑那大学商学院的一楼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心目中的“学者”形象轰然崩塌了。我和Smith教授接触的时间不长，跟他修习了“实验设计方法”这一门课以后他就离开亚利桑那大学去美国首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发挥的作用不重要。首先，我对社会科学实验体系的“世界观”是在Vernon Smith的影响下形成的。其次，

Vernon Smith作为“魔教”的开山祖师，靠着自己的个人魅力拐带了一大批名门正派弟子入坑，这些人包括Jim Cox, Nat Wilcox, Dan Houser等，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Vernon Smith对我有间接的影响。



Jim Cox

Jim Cox是我博士阶段的导师。当年Jim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做的是财政学研究，他的指导老师是公共财政学大师Richard Musgrave。就这么一个名门弟子，来到亚利桑那大学工作以后，在Vernon Smith的影响下开始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虽然Jim和Vernon Smith之间后来发生了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但可以说没有Vernon Smith就没有Jim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学术生涯。Jim是个严格近于严酷的科学家，他好斗的大名传遍实验经济学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实验经济学领域发生了一场被称作The Metric War的大论战。论战源于亚利桑那大学的Jim Cox，

Vernon Smith和Jimmy Walker合作进行的一项第一价格拍卖实验研究，当时年轻一代的实验经济学新星Glenn Harrison针对这项研究所涉及的传统实验方法提出了批评，其主要论点是当实验参与者的决策偏移所对应的机会成本过低时、针对这些决策偏移所做出的统计推断并不可信。听起来很抽象，举个具体的例子：假设在实验市场上，实验参加者选择A会得到10元的回报，而选B会得到9.9元的回报；结果研究人员观察到实验中选A和选B的人基本一样多，这并不意味着实验参加者不懂优化，只能说明A和B之间的回报差异太小了。结果Jim被Glenn Harrison惹怒了，在ESA（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经济科学协会，是实验经济学的国际学术组织）年会上怼了回去，而Glenn Harrison和他的一帮哥们儿弟兄又怼了回来。当年参加论战的学界大咖除亚利桑那群星外，还包括Dan Friedman, John Kagel, Alvin Roth, Andrew Shotter等人。关于这次论战的总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1992年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第82期。这场论战中Jim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谁敢跳出来反对他，他就一定要把谁打倒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现在我在宣讲自己研究成果的时候，回答听众提问的环节不自觉地还会受到当年Jim的影响。当年我读博士的时候，Jim经常教育亚利桑那经济科学实验室的博士生、博士后们，年轻人要经历挫折锻炼……那年Jim的长子带女朋友回家想得到父亲的认可，Jim就带着全家包括儿子准儿媳一起去山里露营：锅啊，帐篷啊，什么重就把什么给人家姑娘背，生火做饭有什么活就让人家姑娘干。Jim说，他能看得出来，这姑娘是第一次野外露营、这些活儿以前都没干过，但姑娘没叫苦没叫累，非常积极热情地参与。在山里走啊走啊走了两个礼拜，姑娘终于得到了Jim的认可。嗯，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小两口过得怎么样了……



Nat Wilcox

Nat Wilcox是我在休斯敦大学读硕士期间的导师，也是我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启蒙者、领路人。Nat Wilcox原本是芝加哥大学的名门弟子，博士期间的主攻方向是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后来跟着Vernon Smith在亚利桑那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就被带到实验经济学的路上一去不返。受Vernon Smith的影响，他也留了长辫子。Nat是这么多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我最难忘的就是在每次ESA会议的间隙，Nat把酒瓶子一拎，往会场外的露台上一坐，Klaus Abbink，Glenn Harrison等一大群青年一代的实验经济学精英（当时三四十岁，现在也都六七十了）就呼啦啦地把Nat围住了，听他吹牛。我当时就想，以后自己论文发表得怎么样姑且不论，Nat的这个范儿咱一定要学会！前面提到的大论战The Metric War当中，Nat处于Glenn Harrison的“阵营”，对亚利桑那大学的传统实验方法持保留意见。当Nat得知我最终决定去实验经济学“圣地”亚利桑那大学读博士，他叮嘱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偏见，你迟早也会在自己的学术生涯里形成自己的偏见。你到了亚利桑那以后，你很可能就会发现Vernon Smith, Jim Cox他们所讲授的实验经济

学跟我讲的有很大不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受了我的影响去反对他们，要静下心来好好向他们学习。现在还远远没到你形成自己偏见的时候。”言犹在耳，不敢或忘。



Martin Dufwenberg

Martin Dufwenberg是我在亚利桑那大学读博士阶段的执行导师。Jim负责把控大方向，而Martin给了我很多具体的建议。Martin强调实验的理论基础，非常严谨，他的作品字字推敲、精雕细琢。和Martin讨论论文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段落讲不通或证据不足，他绝对不往下走。我的科研论文和论文宣讲材料PPT文档的写作风格受Martin影响很大，甚至PPT第一页放作者照片的习惯也是从Martin那里来的。Martin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他每晚在办公室里只开台灯不开大灯，黄色的灯光直接投射到论文稿件上，而他自己躲藏在阴影里，像是个苦苦思索的国际象棋棋手。

这里还要专门提一下二十年前的ESA。那时做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人不多，大家都对后辈特别爱护。我在亚利桑那大学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带着自己的第一篇工作论文第一次参加ESA的国际会议。在会上时任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的陈岩老师(当时她博士刚毕业不久)是我的点评人。虽然当时无论论文本身还是会议宣讲技巧我都非常青涩，但陈老师给了我很大鼓励。在会议的招待晚宴上，我谁都不认识，再加上性格内向羞涩，就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陈岩看到后对我说：“出来开会获得论文的反馈意见当然重要，在会上社交、结识同行也同样重要”，她过来牵着我的手，拉我去跟人结识、聊天。

啊呀，这才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讲得太长了？

罗：没有没有，我听得都入迷了，我想大家也一定会喜欢您的这些故事的。您后来回国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上财也是国内最早开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的高校之一，上财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也一直是与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标杆。您能聊一聊这支团队在组建和交流合作过程中所经历的故事吗？

杜：我2005年博士一毕业就回国工作了。田国强老师2004年开始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以上财为试点进行经济学教育与学科建设的改革。2005年上财经济学院从海外第一批引进了十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在我博士找工作的阶段，AEA面试以后老田和甘犁就在电话里和我长谈，说上财搞的经济学学科创新平台得到财政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于是我提出来，我的专长领域是实验经济学，不论从自己的科研需求来说还是实验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说，在上财建设实验经济学实验室都是非常必要的。田老师听了以后非常支持，要我马上写提案来说服上海财经大学学校层面从财政部资金里出这笔钱。于是我马上咨

询亚利桑那大学实验经济学领域的教授、实验室的管理人员和程序开发人员，从经费上，硬件、软件、实验室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实验室建设的需求。这份提案在我博士毕业、回国之前就放在了上财校领导的案头上，学校非常重视，上上下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经济学院的党委书记是程霖老师，负责财务的是常务副院长胡永刚老师。经费上胡老师从头到尾帮我盯着这件事。学校方面，当时上财的教学设施和校舍非常困难，人称“小破财”。我回国第一次到校园的感觉是：天啊，老田真是在忽悠我啊，这哪里算是个大学，从校园环境看这里顶多算是个中专技校啊……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上财的校领导专门从教学楼里找出一间一百多平米的大教室，装修成实验室。

从布局到装修、购置设备我盯了一整个学期，实验室是2006年3月建成的。从2008年至今，陆续有实验经济学领域新毕业的博士生加入上财经院的实验团队。目前，团队里有我，姚澜，黄振兴，丁婷婷和贺思民。我们几个人的研究方向既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也有互补的部分。比如姚澜老师做过合作方面的实验研究，黄振兴老师的研究侧重风险与模糊性决策实验；贺思民老师理论基础很强，有不少实验涉及博弈中的沟通交流；丁婷婷老师做的是“硬核市场设计实验”，如匹配、高考择校，拍卖等。这些年来，实验团队的成果见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conomet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等经济学国际顶级刊物，Management Science等管理学顶级刊物，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等国际一流刊物，以及《经济研究》，《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权威期刊。除了我们现在还留在上财的这几个人，曾经在上财经院工作，但最终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实验团队、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优秀青年学者还包括李景景，洪福海，李玲芳，苗彬等。在他们当中，我是年龄最大的，经历了上财经院实验

经济学领域从无到有，到形成影响力的全过程。作为“老大哥”，我自己的经验是，要保持研究团队的活力，自己未必要做那个科研论文发表最出色的人，但一定要做提着酒瓶子带着大家伙儿一起聊天吹牛的人。

罗：您回国教授实验经济学，当时国内学生对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您2010年出版的《实验经济学教程》也是国内最早的实验经济学教材之一，教材中的实验程序都还是您自己用VB编写的。

杜：我在2006年开始给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生开设实验经济学的课程，2007年开始给本科生开设实验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的出发点不太一样。研究生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掌握实验方法，帮助学生运用实验手段来回答自己的科学问题。而本科生课程是让学生作为课堂实验中的市场参与者，亲身体会微观经济学教材里面提到的“垄断”，“竞争”，“合作”，“市场供求”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上海财经大学授课时进行课堂实验

现在经济学课堂实验在国内教学已经比较普遍了，但当时对上财的孩子们来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Double Auction Market Experiment）、公共品实验（Public Good Experiment）等等这些实验还真都挺新鲜。特别是有一年，我和美国亚特兰大Agnes Scott College的齐力教授（她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时曾到亚利桑那大学访问，那时我们就成为了朋友）组织各自的学生同时参加了一个网上的经济学课堂实验，孩子们都特别兴奋。现在上财的学生也有不少出国继续留学、学术生涯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比如布赖恩特大学的潘晓菲，普渡大学的魏再延等。我们自己也培养了一些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博士。现在浙江财经大学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走上了快速向上的轨道，我们的博士生有去浙财工作的。希望浙财继续对我们的博士生予以关注！

关于教材，您说的有不太准确的地方。2008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了我的《实验经济学》，这是一本系统地介绍经济学实验室实验方法论的专著。当时刘鹤同志还为这本书写了序。2010年的《实验经济学教程》在2008年专著对实验方法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教学生怎么自己做实验的章节：包括实验说明的撰写，实验设计的案例与习题，以及你提到的实验程序的编写，是用我自己科研论文里中的VB程序做范例。

现在回过头看，VB属于已经过时的工具，现在没有人的实验程序是用VB编的（包括我自己），就连实验经济学的常用开发工具z-Tree也已经更新了很多版本。与我同时期、甚至更早，也有不少同行编写了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专著和教材，但这些专著或教材大多是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出发。我的那本《实验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方法论上的梳理。这里要提到一件事。2018年，当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系主任金煜找到我，问我能否在原有基础上修订实验经济学的教材，原因是新一轮学科评估要开始了，我原先的教材已经出版有一段时间了不算数

了，而上财科研论文是强项但教材这一块是短板。当时我出于各种考虑没有答应他。现在金煜老师因病去世，我又接过了经济系系主任的活儿。想起金老师走以前最后的嘱托，我今年要开始实验经济学教材的修订工作。新版教材将增加实地实验的方法论部分，拿掉过时的程序和案例，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主，结合我国国情，补充行为机制设计的实验室实验与实地实验的新案例。现在这本教材已经列入了2022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敬请期待。

罗：您一直致力于市场机制设计领域的实验研究，在国外有大量结合现实问题的市场机制设计实验研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结论，包括器官捐献匹配、择校入学匹配、住房匹配、选课匹配等。您觉得，联系中国现实问题，市场机制设计实验还可以在哪些领域有所应用？

杜：应该说在机制设计领域，可以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实在太多了，需要用到实验方法的地方也太多了。传统上，拍卖问题和匹配问题是市场设计领域的“硬核”部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但是从广义上看，所有涉及特定经济环境下制度安排的问题，都可以看作机制设计问题。

体制一旦发生转变，其结果不可逆，这使得政府对于各种政策建议和新提案不得不谨慎小心地进行审查，力求进行完整、周密的验证。特别是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如何选择适合国情的体制提案尤为重要：未经审慎考虑的方案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可能加剧原先就存在的弊端。最为不利的是，实施新方案失败会对今后进一步的改革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由于选择和验证体制提案是改革的难点所在，为了降低战略风险，建立在现代经济理论和技术基础上的实验经济学方法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出发，研究人员可以针对实施新市场机制

最有可能出现风险的各种情形设计实验环境，有的放矢地进行实验，以避免机制设计失误所造成的社会损失。

举几个中央重视、群众关心的例子。下一代的教育成长问题涉及民族的未来，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出务工人员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流动儿童问题是极具时代特征、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拿留守儿童来说，现实环境造成孩子缺失父母陪伴，那么在现有约束下，有哪些干预措施能对孩子的健康、学习成绩、未来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这不仅需要理论支撑，更需要大量的第一线的实地实验数据。史耀疆老师前两年就我国近二十年涉及儿童教育干预的实地实验作了个非常详细的文献综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现在我也有不少同事、其它院校的同行正在从事相关的研究。

还比如，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精准扶贫”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发达地区的大中企业、群众去购买被帮扶对象的农副产品，要去找病根儿。我曾经和Jim Cox，同学Subhasish Dugar(现为犹他州立大学教授)进行过讨论，跟国内很多参与过扶贫工作的同行也聊过，大家发现无论从文献出发还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不管是犹太人中的穷人，美国信奉新教的白人中的穷人，印度的穷人……都表现出现时偏好（Present Bias）强烈、短视而不具有长期规划的特征。这一特征往往是环境造就的——比如上世纪美国西弗吉尼亚的穷孩子没什么打算通过上学改变人生处境的，因为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二十来岁就会死于帮派混战。那么是否存在恰当的制度安排来改变贫困人群的现时偏好的状态？这需要大量的实地实验来验证。

这只是随便举的几个例子，其它的还有太多太多。包括“硬核”的市场设计在我国也有很多应用，比如车牌拍卖改革、高考志愿填报改革的实验，有很多同事同行在从事相关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罗：您之前有过长文关于实验研究结论有效性问题的方法论讨论，您觉得实验方法相比较其他研究方法在有效性问题上有着怎样的优势？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与经济学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相比，您觉得会有哪些不同？

杜：就像你说的，我2017年在《学术月刊》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面临着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两方面的挑战。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是指，研究人员分析某一种特定因素所造成的效果时，一定不能把其它原因造成的效果错误地归结到被研究的对象上。比如，当我们分析一种药物对心血管疾病的疗效时，如果病情较重的人服用了药物而病情较轻的人未服药，那么病情的轻重程度会对分析结论造成干扰；如果参加某种劳动技能培训的人的智力水平高于未参加培训的人的智力水平，那么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技能培训的效果”有可能来自于智力水平的差别。而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是指，从有限样本中得出的研究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广到总体中去。比如，某一种药在美国的临床实践中取得了效果，那么这种药能否在中国的临床中取得效果？如果理论经济学家所设计出来的市场机制通过经济实验取得了成功，那么这一机制在现实生活中的效果又会如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确保内部有效性是所有研究工作的起点。误读了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无论其应用环境是否贴近现实，都必然会误导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在内部有效性得到保证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再继续探讨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即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比如，无论经济学理论研究还是经济学实证研究，都有针对经济学理论模型或实证数据分析的Robustness Check，即适用性检验）。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能在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两方面同

时做到完美，理论（Theories）、实验（Experiments）和观察性实证方法（Observational Empirical Methods）适用于不同的科学问题，各有所长。从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内部有效性上，实验室实验可控性最好，优于实地实验，而实地实验又优于观察性实证手段。但是从外部有效性的角度来看，次序正好倒过来——观察性实证方法最优，实地实验次之，实验室实验最弱。

从我自己的科研经验出发，我觉得社会科学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实验控制上。自然科学实验在避免错误归因的过程中能实现直接控制，而社会科学实验只能实现间接控制。比如，测度真空环境下的重力加速度的物理实验，创造真空环境是实验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但经济学实验中，除了实验市场中的交易规则、物质激励规模等因素研究人员可以设定并控制，实验参加者在参加实验以前所受到的社会传统、文化习俗、家庭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无法直接控制。那么经济学实验采用“随机化”的设计方法对这些因素实现间接控制：我们把来自同一总体的实验参加者随机分配到不同实验条件中去，使得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参与者只存在随机差异而不存在系统差异。当样本量足够大时，这些随机差异基本会被抹平。这样，实验结果中不同实验条件之间所体现的差异，只能归因于实验设计所带来的“处理效果”（Treatment Effect），而不能归因于实验参加者的个体差异。

罗：您本科在清华学的是管理信息系统，对数学、计算机非常熟悉，后来又教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做机制设计，身上又有很幽默的文艺气质，包括之前我看到您读书时候也受到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就很想知道，您这样一位文理兼修，学贯中西的学者，会不会想过未来在研究中将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结合起来？

杜：说我受“新儒家”的影响，这个说法不准确。新儒家特指二十世纪以来的部分学者，如钱穆、唐君毅，余英时等。而我从少年时期开始所一直关注的，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中华民族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包括学者的心路历程），文化传承的基本因果序列，以及思想更新的基本进路。从清朝中叶“公羊学派”的复兴，到廖平和康有为的“羊城之会”——廖平创作出了经学研究的高峰《知圣篇》和《辟刘篇》，而康有为写出了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再到后面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以及你提到的那些被称作“海外新儒家”的学者。所有这些学者的学术视野各有差异，思考方法各有所别，而学术主张也各自不同。但这些学者都面临着同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如何走入近代、乃至现代？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引发了多种盛行一时的思潮：比如早期的调和论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说；还比如，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未曾断绝的“全盘西化论”。

我这里简单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思考。

首先我要举两个二十世纪初叶的学者的例子。荣格是一代心理学宗师，他的一生受东方文化和宗教的影响甚深，从他对梦的分析和对原型的解释里能看到“感而遂通天下”的影子。而王国维早年研习西方哲学和方法论，受启发甚多。比如，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深入细致，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今天的考古学者，在方法论意义上仍然没有超越静安先生的高度。

中国自古就有“老子出关化胡”的说法，这是华夏文化向外辐射传播的象征。其实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所谓“西学”，在其发展的源头上

未必没有昔日“中学”的烙印；而今日的“西学东渐”，就好比当年老子在西域的身外化身，带着几千年新的见知所闻回归本体，与本体的见知所闻相互印证。由是观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又何尝不可以为体；西学可用，而中学又何尝不可用！

继承传统与革新是一对永远的矛盾主题。传统不是一堆僵化过时的死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传统本身像一条流动的河，每个时代和每个人眼中的传统都是相应历史条件下一种新的理解。传统便在这种不断的理解和解释下实现自己的生存进化。只要一个民族仍有生命力，它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就不会停止。我们不必担心革新会造成对传统的决裂。

“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够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黑格尔），革新所造就的生动和自由必将构成传统的一部分。对于以前我们没有接触过的新方法、新工具，我们要大胆地拿来试、拿来用。用史学家许倬云的话说，“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拿出这样的勇气，我们才有机会找到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学术进路。

罗：闲暇时，您对音乐情有独钟，手风琴演奏是我们每次会议研讨杜老师的保留节目。音乐会不会给您的研究带来灵感？

杜：说到手风琴，有这么一件往事。我刚到亚利桑那大学的时候，参加了经济系组织的一年一度的迎新活动——全系师生在商学院的大堂一边吃匹萨饼，一边聊天。我和负责教学的副系主任John Drabicki聊起来，说自己来美国以后一直没机会拉手风琴。Drabicki教授说，“我小时候我爸爸逼着我学手风琴，可我一点都没有兴趣。现在我小时候用过的手风琴在我们家车库里已经放了四十多年了没人动。这琴就送给你了！”这样，这把琴陪伴我在图桑度过了许多孤独的时光。我还记得，我的同学Maros Servatka（现为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Rado

Vadovic(现为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 Volodymyr Bilotkach (现为新加坡理工大学教授), 几个人晚上喝得醉醺醺地来我的住所找我, 我用手风琴伴奏, 大家一起唱了很多革命歌曲: 有《华沙扬卡》,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最后, 我用中文, Volodymyr用乌克兰语, Maros和Rado用斯洛伐克语, 大家用各自的母语一起合唱了《国际歌》。每次有同学开Party, 都会叫我把琴带上。压轴节目是我用手风琴伴奏, 拉俄罗斯民歌《卡林卡》, Volodymyr跳俄罗斯的民间舞, 把气氛推向高潮。等我博士毕业离开图桑的时候, 我把琴送给另一个会拉手风琴的学弟了。

音乐会不会给研究带来灵感? 这是个很有玄学色彩的问题。但音乐确实会塑造一个人的气质和性格。我非常偏爱民族性格强烈的音乐家, 比如德沃夏克, 格里格。我尤其钟爱俄罗斯的音乐, 俄罗斯的旋律里有一种渗入骨髓血液的忧郁, 从格林卡, 柴科夫斯基, 到强力五人团, 二十世纪的拉赫玛尼诺夫、萧斯塔科维奇, 还有那么多优美的俄罗斯民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不同色彩的旋律是不同阶段的主题。我少年时期的色彩是里姆斯基·科萨阔夫的《天方夜谭》, 步入青年时期挥之不去的是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大学阶段陪伴我最多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到进入成熟阶段给我启发最多的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

CEBD 博士后陈俞有出站 以优异成绩入职浙财经济学院

2021年10月20日，CEBD博士后陈俞有以优异成绩完成答辩，顺利出站并入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其出站报告《社会困境、社会规范、社交网络与亲社会行为——基于神经实验和演化模拟研究》，运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演化博弈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研究了人类社会规范何以突破社会困境的制约，在大规模的陌生人群中诱导出互相合作的亲社会偏好。报告所体现的系统性、前沿性和创新性，受到答辩组专家的一致好评。陈俞有在博士后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VMPFC With tDCS Alters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The Role of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Public Good and Public Bad Games: Evidence From a tDCS Study”和“Distinguishing punishing costly signals from nonpunishing costly signals can facilitate the emergence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分别发表于1A级SSCI和SCI英文学术期刊*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Frontiers in Psychology*和*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陈俞有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所研究员王铮教授。2018年10月进入浙江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管理站，合作导师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A类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首席专家叶航教授。

2021 年 CEBD 科研成果统计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CEBD 成员在“课题立项”、“著作出版”、“论文发表”方面获得优异成绩；其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出版专著 1 部，在中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 篇，在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2 篇——

课题立项

朱海城（基地特聘研究员）：中国共产党百年商业政策的历史演进、经验总结及学习运用研究，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著作出版

郑恒（基地研究员）：《生命接力——助推中国器官捐献登记的实验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1 年 11 月出版

论文发表

1. 罗俊（基地研究员）等：收入差异、不完全信息与价格歧视行为的实验研究，《世界经济》，2021 年第 9 期；
2. 罗俊（基地研究员）等：群体身份、竞争性匹配机制与个人捐赠——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21 年第 5 期；
3. 夏巍巍（基地研究员）等：宗教信仰与信任：一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21 年第 1 期；
4. 谈非（基地特聘研究员）等：Analytic Policy Function It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21.11；
5. 谈非（基地特聘研究员）等：DSGE-SVt: An Econometric Toolkit for High-Dimensional DSGE Models with SV and t Errors,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2021.10；

6. 谈非（基地特聘研究员）等：Origins of monetary policy shifts: A New approach to regime switching in DSGE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021.9;
7. 于平（基地博士后）等：Modulating OFC Activity With tDCS Alters Regret About Human Decision-Mak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9;
8. 谈非（基地特聘研究员）等：Financial distress and fiscal inflation,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21.8;
9. 陈俞有（基地博士后）等：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VMPFC With tDCS Alters the Social Framing Effect,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21.8;
10. 陈俞有（基地博士后）等：The Role of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Public Good and Public Bad Games: Evidence From a tDCS Study,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21.7;
11. 王锦锦（基地博士后）等：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over the Frontopolar Cortex (FPC) Alters the Demand for Precommitment,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021.7;
12. 李雨真（基地博士后）等：The role of the mPFC in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majority and expert opinion, *Neuropsychologia*, 2021.7;
13. 夏巍巍（基地研究员）等：Religious identity, between-group effect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Finance*, 2021.4;
14. 郑万军（基地博士后）等：Effect of Modulating Activity in the Right DLPFC on Reveng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Investig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4;
15. 郑万军（基地博士后）等：Effect of Modulating DLPFC Activity on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tDCS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1.